

文章编号:2095-0365(2010)03-0066-05

略论北宋前期循吏的积极作用 及其原由

白雪松¹, 李秋生²

(1.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2. 河北金融学院 社科部, 河北 保定 071051)

摘 要:北宋前期的循吏,大多政绩出色,在发展农业、稳定治安、防灾赈灾、改善风俗、出使邻邦诸多方面颇有作为,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究其原因,除了统治者的提倡与选拔,也与士大夫自身的修养有关。

关键词:北宋前期;循吏;积极作用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循吏”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循吏列传》中,后为班固的《汉书》与范晔的《后汉书》所承袭,且为历代史书沿用。司马迁认为,循吏最基本的特点是“奉职循理”,即依循人情物理,依法办事的官吏。自《史记》之后,历代史书对“循吏”概念的理解都遵循“奉职循理”这一点。宋代循吏据史书记载以北宋前期居多,历史功绩也最大,所以本文集中考察该时循吏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作为,以阐释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本文所谓的北宋前期,大体是指太祖到仁宗这四朝。

《宋史·循吏传》开篇云:“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牧守令录,躬自召见,问以政事,然后遣行,简择之道精矣;监司察郡守,郡守察县令,各以时上其殿最,又命朝臣专督治之,考课之方密矣;吏犯赃遇赦不原,防闲之令严矣。”这里列出了判别循吏的三条标准:精审的选拔,严密的考核,严格的惩戒。可见宋代对官员的选任、考核、惩戒措施都相当严格,要合乎这三条标准,且“其间必有绝异之绩”^[1],能称得上“循吏”,确实不易。而循吏也是有相当出色且务实的政绩的。北宋前期的循吏在经济、行政、司法、外交等诸多方面都有较好的作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务兴农事,兴修水利

《东都事略·循吏传》云:“自唐季以来,王政不纲,天下以战争为事,五代之际,民失耕桑之业,天既厌之矣。艺祖受命,知民疾苦,故自即位以来,劝农之诏屡下,由是斯民欣然有乐生之意,而治民之吏率皆有循良之风。太宗继承,守而勿失,真宗、仁宗德泽深厚。于斯时也,吏皆以平易近民为政,招怀流亡,导达沟洫。赵尚宽、高赋治有异效,最先褒宠,以风天下。”唐末五代的战乱给农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北宋初年很多地方田园荒芜,人民疾苦。在封建社会,农业一向是立国之本,恢复农业、发展生产当是北宋统治者的一项要务。太祖“劝农之诏屡下”;太宗曾下诏有司议均田法,陈靖就曾上书进言:“两京东西千里,检责荒地及逃民产籍之,募耕作,赐耕者室庐、牛犁、种食,不足则给以库钱。”他又发明了“分殿最为三等”的考课之法;真宗即位后,“复列前所论劝农事”,陈靖又“请自京东、西及河北诸州大行劝农之法”^[1],其主张虽泥古不可行,但足见北宋前期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且以陈靖为代表的诸多循吏,多所建言。而以赵尚宽、高赋为代表的大部分循吏则身体力行、付诸实践,是国家政策的切实执行

收稿日期:2010-04-25

作者简介:白雪松(1981—),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学史。

者。他们在地方上招抚流民、开田垦荒、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成效甚为显著,也最早受到表彰,于是太宗把他们当作循吏的楷模予以表彰,以风天下。

又如“嘉祐中,(赵尚宽)以考课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经五代乱,田不耕,土旷民稀,赋不足以充役,议者欲废为邑。尚宽……乃按视图记,得汉召信臣陂渠故迹,益发卒复疏三陂一渠,溉田万余顷。又教民自为支渠数十,转相浸灌。而四方之民来者云布,尚宽复请以荒田计口授之,及贷民官钱买耕牛。比三年,榛莽复为膏腴,增户积万余。”^[1]唐州历来是土地肥沃的丰收之地,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战乱,田地荒芜,人口流离,到了“赋不足以充役,议者欲废为邑”的窘迫境地。赵尚宽教导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垦辟良田,招抚流民,终使唐州恢复了往昔繁盛的旧貌。赵尚宽对唐州的治理可谓是北宋初年循吏的典范。他的继任者是高赋。高赋在任内继续招募流民、计口授田、兴修水利,与赵尚宽的治理政策一脉相承。由于二人均“勤于农政”,唐州的垦田数、人口数显著增加,农业迅速恢复发展。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利,其他循吏亦多有兴修水利者。如崔立“知江阴军,属县有利港久废,立教民浚治,既成,溉田数千顷,及开横河六十里,通运漕。”鲁有开知韦城县时“兴废陂,溉民田数千顷。”程师孟“劝民出钱开渠筑堰,淤良田万八千顷。”^[1]他们的措施都便利了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奉法循理,捕盗安民

北宋大多数循吏都能做到既以法律为准绳,秉公执法,又能顺从事理,按事物规律办事。如张纶“所部卒纵酒掠居民,纶斩首恶数人,众乃定。”^[1]可见他对部下决不姑息、包庇。做的更加出色的像周渭,“为白马县主簿,大吏有罪,渭辄斩之,太祖奇其材,擢为赞善大夫。后通判兴州事,有外寨军校纵其士卒暴犯居民,渭往责而斩之,众莫敢动。上闻益壮之,诏褒称焉。”^[1]他不仅不纵容自己的属下,甚至其他外地军官的属下在本地犯案亦绝不纵容,且惩罚极严。在处理刑狱方面,诸多循吏亦有很多出色的作为。如邵晔知蓬州录事参军,“时太子中舍杨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张道丰等三人被诬为劫盗,悉置于死,狱已具,晔察其枉,不署牒,白全当核其实。全不听,引道丰

等抵法,号呼不服,再系狱按验。既而捕获正盗,盗丰等遂得释,全坐削籍为民。”^[1]邵晔审查案件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崔立“为果州团练推官,役兵犂官物,道险,乃率众钱,佣舟载归。知州姜从革论如率敛法,当斩三人,立曰:‘此非私己,罪杖尔。’从革初不听,卒论奏,诏如立议。”^[1]崔立能够做到按律量刑,维护了法律的公正性。又如鲁有开“知金州,有蛊狱,当死者数十人,有开曰:‘欲杀人,衷谋之足矣,安得若是众邪?讯之则诬。天方旱,狱白而雨。’”^[1]又张逸知益州时“华阳骆长杀人,诬道旁行者,县吏受财,狱既具,乃使杀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气不直,岂守者杀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诛之,蜀人以为神。”在他知开封府时“有僧求内降免田税,而逸固执不许。”^[1]又王明,“药元福为原州刺史,又为陈州防御使,明皆在幕下。元福嗜杀,明劝之以宽,多所全宥。”^[1]诸如此类,大多循吏既不畏惧地方豪强,又不怕得罪自己的长官,都能做到奉法循理,秉公办事。

许多循吏在保境安民方面也做得相当出色。如张纶“从雷有终讨王均于蜀,有降寇数百据险叛,使纶击之,纶驰报曰:‘此穷寇,急之则生患,不如谕以向背。’有终用其说,贼果弃兵来降。”又“奉使灵夏还,会辰州溪峒彭氏蛮内寇,以知辰州。纶至,筑蓬山驿路,贼不得通,乃遁去。”可以看出,张纶还是很有韬略计谋的。鲁有开知韦城县时“曹、濮剧盗横行旁县间,闻其名不敢入境。”盗贼不敢入鲁氏所辖县境,可以想见,鲁氏对盗贼的打击力度还是颇大的。程师孟为江西转运使,“盗发袁州,州吏为耳目,久不获,师孟械吏数辈送狱,盗即成擒。”^[1]程氏对与匪串通的官吏的惩罚毫不手软,对抓捕盗贼起了关键作用。

三、防灾赈灾,整治风俗

北宋前期,全国各地各种自然灾害多有发生,而地方上的循吏,既是朝廷赈灾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又是处于最前线的指挥者。诸多循吏在地方上工作多年,对灾害的预防和治理,经验丰富且能大力贯彻。他们往往具有准确的预见性,又能因地制宜,修建防灾工程,以保障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废不治,岁患海涛冒民田”,张纶“表三请,愿身自临役”,最终修复了捍海堰。此举又使得泰州的人口增加了二千六百户。邵晔知广州,“州城濒海,每

蕃舶至岸,常苦飓风,晔凿内濠通舟,飓不能害。”修内濠以通舟,邵晔的举措使得广州海上贸易的船只避免了飓风的威胁。程师孟“知洪州,积石为江堤,浚章沟,揭北闸,以节水升降,后无水患。”^[1]薛颜“徙广南河东陕西路,浮桥岁为河水所败,颜即北岸疏上流为之渠以顺水怒,又以溉其下陂鹵之田,而民利之。”^[3]

在灾害发生后,循吏们也都能够想方设法赈济灾民。如鲁有开“知卫州,水灾,人乏食,擅贷常平钱粟与之,且奏乞蠲其息。”崔立知兖州时“兖州岁大饥,募富人出谷十万余石振饿者,所全活者甚众。”许遵“知长兴县,会县有水灾,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赈济,终以无患,益兴水利,溉田甚博。”^[3]张逸知益州时“会岁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减价以振民。”难能可贵的是有些循吏还能提前做好赈灾准备,未雨绸缪。如吴遵出知常州“尝预市米吴中,以备岁俭,已而果大乏食,民赖以济,自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1]无论是防灾还是赈灾,循吏们的举措为百姓的生活生产提供了保障,稳定了北宋前期的地方基层统治。

北宋前期的循吏在发展地方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还整治地方上的落后习俗,对百姓进行教化。赵尚宽知忠州时,“俗畜蛊杀人,尚宽揭方书市中,教人服药,募索为蛊者穷治,置于理,大化其俗。”高赋知衢州时“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余家世蓄蛊毒,值闰岁,害人尤多,与人忿争辄毒之。赋悉擒治伏辜,蛊患遂绝。”^[1]赵尚宽、高赋革除了当地蛊毒害人的落后习俗,促进了社会进步。王嗣宗知邠州时,“州有狐王庙,巫祝假之以惑百姓,历年甚久,举州信重。”“嗣宗毁其庙,熏其穴,得狐数十头,尽杀之。”^[4]破除了当地百姓的愚昧迷信。张逸知长水县“兴学校,教生徒。后邑人陈希亮、杨异相继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枝里。”叶康直知光化县时“县多竹,民皆编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宁火患。”^[1]张逸、叶康直的举措传播了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为当地培养了人才。这些都是和循吏们的积极有为分不开的。

四、稳定边境,协助平叛

北宋一代,一些出色的有外交才能的循吏还担当过同邻国交涉的事务。景德年间,交趾内乱,诸子争位,邵晔“为缘海安抚使”,驻岭表,“贻书安南,谕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护等即时听命,奉龙廷主军事。”^[1]邵晔通过劝谕稳定了交趾的国内

局势,同时也稳定了宋朝的边境。程师孟“判三司都磨勘司,接拌契丹使,萧惟辅曰:‘白沟之地当两属,今南朝植柳数里,而以北人渔界河为罪,岂理也哉?’师孟曰:‘两朝当守誓约,涿郡有案牘可覆视,君舍文书,腾口说,讵欲生事耶?’惟辅愧谢。”程师孟反驳了契丹使者妄图侵占国土的图谋,维护了宋朝的国土利益与边界安全。又“贺契丹主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价东向。师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争至暮,从者失色,师孟辞气益厉,叱候者易之,于是更与迎者东西向。”^[1]在此他又保持了使者的尊严,即是维护了北宋朝廷的尊严。除了处理交涉事物,许多驻扎边州的官吏更是每天同邻邦打着交道,他们同样尽着自己的努力维护着边境的稳定与安全。比较出色的像李允则,知雄州十八年,“契丹中机密事,动息皆知之,当时边臣无有及者。”^[5]

北宋边界亦多有兵事者,其中亦有一些循吏出谋划策,发挥了辅助作用。侬智高进犯广南时,朝廷派遣狄青作宣抚招讨使,狄青到后首先微服往见久在广南做官的陶弼请教对策。陶弼“为青言广南利害曰:‘官吏皆成贪墨不法,惟欲溪洞有边事,乘扰攘中济其所欲,不问朝廷安危,谓之‘做边事’,涵养以至今日。非智高能至广州,乃官吏不用命,诱之至此。’”狄青听从陶弼建议,“按法诛不遵节制、出兵而败陈崇仪而下三十余人。”^[6]之后果然一鼓作气打败敌人。广南地区得以太平,恢复稳定的局面,陶弼的建策起了极大的作用。王罕为广东转运使时,侬智高入寇广州,王罕于惠州“呼耆长发里民,补壮丁”,“增弓手二千”。并“简卒三千,方舟建旗,伐鼓作乐,顺流而下。”至广州后,“悉众登岸,斩木为鹿角,积高数仞,营于南门。”^[7]侬智高见守备森严,遂不敢犯。

北宋前期,吏治清明,产生了大量良吏,奉法循理,积极有为,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北宋前期统治集团的倡导。一个王朝初年的统治者往往是比较励精图治的。同样,北宋初期的统治者在建国后善于汲取唐末五代战乱的历史经验教训,能够体察下情,以身作则。早在建隆二年太祖就说过“烦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也。”^[8]并且太祖确实生性节俭,“寝殿设布缘苇帘,尝出麻履布衫以示左右,曰:‘此吾故时所服也。’”^[9]而太宗书《戒石铭》“以赐郡国,立于厅事

之南”,其词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0]统治者的表态,必将对官吏阶层的道德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由此,官吏们亦不难体察圣意,以民为本,励精图治。

其二,士大夫集团的操守风尚。宋代士人比较亲民,同情农民的苦难,敢作敢为,蔑视贪惰,同时也有着勤劳俭朴的优良风尚。太祖曾经问王昭素治世养身之术,“昭素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上爱其语,尝书屏几间。”^[11]不仅如此,宋代士大夫阶层中还互相推崇优良的道德品行,颇有操守。“章献太后临朝,内侍省都知江德元权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过杭州,时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时中人奉使者,无所加益。”李及不阿权贵,“时人服其操守”^[12]。士大夫们自己也非常珍惜自己的官品声誉,“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故相与爱惜成就,以待其用。”^[13]这种注重道德与操守的风尚一旦形成,就在士大夫阶层的心里形成了一种无形的价值判断标准,人们会自觉地遵循。

其三,广泛审慎的人才选拔。人才选拔关系到国家的兴衰,选拔得当则政治清明,国家富强。北宋初年即扩大了选士范围,工商、杂类子弟和边远地区的士人均有了应举的可能。而在如何选拔人才的标准上,宋代士大夫们比较看重德与才两个方面,而且要以德为先,以德为重。李觏说:“才乎才,有德以为功,无德以为乱。”^[14]北宋前期对人才的选拔是严谨审慎的,而能够在人才众多的官员队伍中脱颖而出称得上循吏,则更是难上加难。如此,则在制度上保证了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有着较高的水平。光是严格的选举还不够,在惩戒措施上宋初“尤严贪墨之罪”“而不赦犯

赃”^[15]这一点也是十分值得我们注意的。

其四,宋代儒学的勃兴。儒学在宋代的勃兴,“宋初三先生”(即孙复、胡瑗、石介)与邵雍有着首功。孙复“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车驾幸太学,赐绯衣银鱼,召为迓英阁祗候说书。”石介“入为国子监直讲,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由此益盛。”胡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从之游者常数百人。”^[16]宋初三先生教学有方,为人师表,而邵雍亦不在三先生之下。他们的道德修养被士大夫们所推崇,而他们的诲人不倦,也调动了士大夫们的读书兴趣。在他们的带动下,儒学的复兴,提升了北宋初期士大夫阶层道德修养与文化修养的整体水平。而士大夫阶层整体素质的提高必将带动更多良吏的涌现。

北宋前期的循吏本着“凡政皆务以利民”的宗旨,奉职循理,为民兴利除弊,执法公允,处事得宜,作为国家政策在地方上的直接执行者,能切实落实国家政策,造福一方,对经济的迅速恢复、社会的稳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他们受到百姓的拥戴,皇帝的褒扬。赵尚宽“留于唐凡五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苏轼作《新田》、《新渠》诗以美之”。高赋“玺书褒谕,宣布治状以劝天下,两州为生立祠”。张纶知泰州后,州民“为立生祠”。程师孟“洪、福、广、越为立生祠”。宋太宗夸奖邵晔曰:“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程羽“泣事循谨,太宗称其长者”^[3]。这些,恰是对循吏们政绩的肯定。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百姓是出于衷心的爱戴,但最高统治者褒奖循吏是要在百官中树立样板,以此鞭策官吏执行国家政策,效忠朝廷,使其安定民心,努力生产,向国家提供更多稳定的赋役,以实现统治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 [1](元)脱脱. 循吏传. 卷 426.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 [2](宋)司马光. 周渭治州县. 卷 1. 涑水记闻[M].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 [3](宋)王称. 循吏传. 卷 112. 东都事略[M].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9.
- [4](宋)司马光. 王嗣宗. 卷 3. 涑水记闻[M].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 [5](宋)司马光. 李允则知雄州. 卷 6. 涑水记闻[M].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 [6](宋)王钰. 默记(卷上)[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 [7](元)脱脱. 王罕传. 卷 312.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 [8](宋)李涛. 建隆二年. 卷 2.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 [9](宋)司马光. 太祖性节俭. 卷 1. 涑水记闻[M].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 [10](宋)洪迈. 戒石铭. 卷 1. 容斋续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11](宋)李涛. 开宝三年. 卷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下转第 83 页)

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 1993.

- [11] Ezenwa—Ohaeto. Neo-Formalism: Recent Trends in the Criticism of African Fiction by Nnolim, Eme-nyonu and Chukwuma[M]. Current Trend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in West Africa, eds. E. N. Eme-

nyonu and C. E. Nnolim. Ibadan: Kraft Books, 1994.

- [12] Izevbaye D S. Shifting Bases: The Present Practice of African Criticism[M].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 1990.

Pragmatic Criticism: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Af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XIN Lu-g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Law and Arts of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uzhou 344000, China)

Abstract: African literary critics usually adopt social—cultural approach when they are engaged in Af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such factors as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ones. They view literary criticism as a part of social criticism. While not rigidly adhering to certain special literary criticism approach, they adopt the suitable approaches for the pragmatic sake. They don't pay close attention to literary form itself, and even regard the literary form itself as a part of social factor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African literature; pragmatic criticism; social-cultural criticism

(上接第 69 页)

- [12](宋)司马光. 李及不阿权贵. 卷 10 涑水记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3](宋)洪迈. 高科得人. 卷 9. 容斋续笔[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14](宋)李靓. 潜书八. 卷 20. 直讲李先生文集[M]. 上海: 上海书

店出版社. 1989.

- [15](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卷 12)[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 [16](元)脱脱. 孙复、石介、胡瑗传. 卷 432.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On the Positive Role of Upright Officials in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Reason

BAI Xue-song¹, LI Qiu-sheng²

(1.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Hebei College of Finance, Baoding 071051, China)

Abstract: Many of the upright officials of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achieved considerable success in their official careers, such as in developing agriculture, keeping public order, taking measures to prevent disasters and providing relief to people in stricken areas and taking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history, the reason for which, besides the ruler's advocacy and selection, also has relations with the self—cultivation of scholar-bureaucrats.

Key words: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upright officials; positive role